

胡双宝

中国图书文化资证

——《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读叙传选》编审记

ABSTRACT The two books can be used not only as textbooks, but also as reference books for researchers in 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ies, book history, history of culture, etc.

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ies. Book history. History of culture. Ancient collections.

CLASS NUMBER G256.1

由袁咏秋、曾季光两位先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的《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和《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读叙传选》(以下分别简称“文选”、“叙传选”或合称“二书”),是国家教委文科教材编写规划审定的文献资料书,意在为高等学校图书馆专业师生提供博览历代藏书、治书渊源大略之资。弘扬中华图书文化的意识,明显地贯穿其中。诚如“文选”前言所述:“编辑意向重在浓厚文化意识,传播读书种子及书香风尚”。

二书相互联系,又如书名题示,各自贯穿一条主轴线。“文选”以“著录”为主线,鉴于历代典籍渊萃在中秘,诸史如汉、隋名志,就原著裁篇别出,以著于录;无志之史,其有后世补志或精研翔实论评之作,或虽非官书而为官录所甄采,或私家撰述有裨于治学治书者,一并选录。

“叙传选”则以藏读著述及名家遗闻轶事为主线,具体体现于经籍与教化、古籍之源流故实及博稽著述、雅尚图书等内在蕴含,而以中国历代藏书机构沿革为之冠,表明了编纂者的高远立意及卓尔见地,用以构架二书眉目清爽,文化之义著焉。

中国是图书大国,有关藏书、读书的论著,自成体统,滋益代代学子,而且不断拓宽增广。二书主编视野开阔而措意搜求,本着由博而约的精

神,精心采撷,精致编缀,使许多散篇佚章,百衲集曲序,形成有内在联系的有价值的图书文化系列,不仅便于披览,便于旁索广求,且于古今中外图书文化交流史上架起了一座索绪天桥,因而是两部不可多得的极富活力的撰著。

中国是国家藏书和私家藏书并重的国家。国家藏书制度起源很早,自汉代开始大收典籍,置写官,使刘向父子校书秘阁,于是总群书而奏其《别录》、《七略》,班固删其要为《汉书·艺文志》,于是而有诸史艺文经籍志。三国六朝以后,后起之书方兴日异,类分部次不能不有所变迁,然自《汉志》六略至《隋志》四部迄清之《四库》目,千百年间,虽小有增损,但大体沿用无以易,因刘略班马剖析艺文,总绪百家,有意推本者仍六经六艺之旨;六艺其辞为文,其理则通于类;分类乃学者之至要。《七略》始创之光,及其流为四部,中经历代簿录家苦心细绎排比之迹,“文选”均有论列。

国家藏书机构演变发展到近代,逐步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叙传选”专辟“近代图书馆运动及国家图书馆早期规模”一目,收录自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南洋公学等所属图书机构的设置至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创建与发展的文献近百件。其中有三件特别值得一提。

其一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第一馆、第二馆

沿革及概况》,略述清季设于什刹海广化寺,后扩及中海居仁堂之京师图书馆即第一馆,与庚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于北海的北京图书馆即第二馆筹组合并事宜。其二是《1909~1949年北京图书馆纪事》。前者详于机构组建;两馆筹划合组,历时多年其间,合组之议一度中辍,数易馆名,表明“要用美国退还的赔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鲁迅语)。后者详于图书度藏及两馆合组后诸多实务而脉络分明。两者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中国图书馆和它的国家共命运——“被近代化”的历史;同时也表明在国家积贫积弱之际,人们期盼吸收西方文化新精神的积极性。北图在其筹办之初,承内阁大库之遗,随即咨调各省官书,通行各省检送立案出版图书,1916年10月3、4、5日接连三咨全国征集各省新志、地志、金石拓片、碑碣石刻等,受赠承受外国政府官书、出版物,定期交换馆员,聘请外籍专家等。新建馆舍、皇典丽,盛极一时。

其三是钱存训《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籍运美经过》专文。先生曾先后主持北京图书馆南京分馆、上海分馆馆务,1937年受命于国难中,主要任务是保护北平馆南迁善本图书。珍珠港事变前,为万全计,奉命策划,联络秘密运送这批善本去美保存,25年后返回台北等经过情形。先生学究古今,文擅中西,坐拥书城,本可多享书福。无奈际遇“二战”,半个多世纪中先生亲历目睹却是这批宋金元明历代宝传下来的稀世之珍的迁徙流散或还非其主的命运,文中精神窘迫,惊心动魄之情景跃然纸上。

“文选”之“历代图书著录名著、论评”目下,刘向父子、郑樵、王应麟、章学诚等十几位名家名著为本目之所宗自不待言,而古代丛书、类书之形制成书亦多有其悠久历史和优良特点,亦治目录学者所有事。梁启超《图书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傅增湘《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序》、刘国钧《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导言》等一批近现代著述亦择要收入。

以上两端表明,二书既重本源,亦重流绪,而不执泥于古今厚薄之度。

中国向以私家藏书著称,且名家辈出,向歆以私藏与中秘相参校,官私相补,互通有无,等等,自来蔚为风尚;民间藏书者不可胜数,历代公认藏书名家亦无法尽录,只能举要。“文选”设“私家撰述各类书目举要”一目,举自欧阳修《集古录》至曹秋岳《静惕堂书目》三十余家,晁公武郡斋、陈振孙直斋、黄虞稷千顷堂、瞿镛铁琴铜剑楼等自在其中。所举各家,录文亦有所择别。如范氏天一阁录阮元《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乾隆谕旨、钱大昕《天一阁碑目序》等,并举《李氏易传集解十七卷后附王氏略例乙卷》《汉上周易集传十一卷卦图三卷丛说一卷》二种为例,使见目如见书,足以显其特点。“叙传选”之“私家收藏之聚散与流传”目下,有刘汝霖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家藏书》、《唐书所载诸家藏书》及袁同礼所撰宋、明、清藏书概略等数篇。既有一代综述,又有典型证说,详略有致,其迹昭昭。“叙传选”又录有日本学者岛田彦桢《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及藏书家董康附言(按:皕宋楼为晚清陆心源藏书处,藏书15万卷之多,内有宋版书200部,极为名贵。陆氏卒后,其子于1907年以11.8万圆售予日本岩崎氏,藏静嘉堂文库),为私家藏书之特写。岛田氏以中国宝藏入籍日本为“人世之大快事”,董康则“太息者累月”。编者采录着笔于此,以不忘国家积贫积弱时图书之又一厄也。

办理四库全书圣谕“文选”录入11则,除纂辑起意、丛书定名等通常事项外,有两则较为引人注目。一为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谕《宗泽集》、《杨继盛集》等书中“夷”“狄”等不必改为“彝”“敌”,并云:“若有心改避,转为非理,如《论语》‘夷狄之有君’、《孟子》‘东夷西夷’,又岂能改易,亦何必改易?”一为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谕所进明代徐必达《南州草》等所谓“违碍应毁书籍”的处置,认为“《南州草》所载奸商奸结贿欺君诸疏,俱持论不挠,极为抗直”,“诸臣在胜国言事,于我国家间有干犯之语,彼自为其主,不宜深责”。四库全书3000余种图书,确有删改之处,存目6000余

种,确有价值较高而未刊之书,所毁图书确有不该毁者,但后人乃至今人指责《四库全书》编纂者为维护清统治者的狭隘利益而妄加删改抽毁,甚至认为“删去的都是好书”,则属偏颇之论。近七八年间为编纂《全宋诗》接触过《四库全书》中几乎全部宋人别集中诗歌部分及有关资料的陈新先生认为“《四库全书》纂辑伊始,对原书是相当忠实的”,明确不同意“恣意篡改”说(详《文教资料》1997年第二期)。“文选”所录11则圣谕,较为全面地说明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原则及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处理,实为有识之见。

文字的发明与图书的出现相为踵继,都是奴隶制社会即“文明时代”的产物。“叙传选”代序《古代中国的文字传播和文化传统》(钱存训著《书于竹帛》绪论)历述汉字、印刷术等与图书的影响;“叙传选”第二编摘述有关文字、笔、纸、印刷及书册制度等资料数端,以明相互关系,于此显然之处未多引述,而于本编特辟“古籍流传与书院”一目。书院是古代教育的一种组织形式,是讲学、读书之所,也是藏书之所,一般由某一著名学者创导,聚众授受,聚积图书,教学相长。该目采摭自孔子第一个创立私学,教以诗书礼乐,傅玄请举学校之纲,明其大教,长其节义;李觏举秦秦汉衰亡故事,切谏学校之有关国家,朱熹请敕额并御书于白鹿书院,尤以受赠《汉书》送使藏读乃书院、图书与教育血脉渊源之典型史实,及宋濂之随书纳忠、王守仁之“经正则庶民兴”等等,均“教育为立国之本”,“文礼教道之结人心”的教育思想植根之沃土,犁地三尺可见!是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文化中永恒的宝贵遗产和优秀传统。一般的史实、史论经过精心的连缀细绎,读之令人耳目一新,文献足征,乃图书与文化教育互资互证极尽其致之又一端。

二书立足于专业而不囿于专业,泛舟书海而有涯:从古代馆阁藏书,秘文著述和某些重大古籍的编纂,校理成书及其聚散源流故事;从古者藏读著述中透析中国古籍文化发生、发

展的历史环境及于此环境中长育成就的人、书和他们的道德事功等等。所选如司马光之致力于修《通鉴》、王明信(明清)之宁守书而不官,王世贞舍一庄而得宋版《汉书》,即以身作蠹鱼其间,黄荃圃(丕烈)枯坐书斋,呵冻校书以消寒等等,历历可见读书人精神之所注。祁承爕《藏书约》、《聚书训》强调“经济”,即经世济民,亦即实用。胡应麟反对为藏书而藏书,强调读书颐养。他的《经籍会通》引述“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珍瑟”,这是尤延之为众多治书人精神之总结,亦是引述者自己的感受。“文选”不拘一格,一并录入。二氏所论,乃为从不同角度论述读书与人生的关系。“为振兴中华而励志研读”(“叙传选”前言)之立意,导向亦甚切合读书为国,为国读书精神。

“文选”和“叙传选”共计90余万字,含长短文700余篇(诠释注引用书近500种),分门别类、编录条贯,宛然一体,收纳若干稀有罕见文章,触之犹有余热,确为主编者目系心知,读书颐养之羹膏,以飨读者,可省却不少寻觅之劳。二书不仅有教学研究参考之功用,对研治中国图书馆史、书史、文化史者亦将于资料编录思想、撰例等方面有所启发。

“文选”任继愈先生序中希望包括古代图书著录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能为当前文化建设服务,能对世界文化产生影响。顾廷龙先生序中希望吸取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并赞许二书编纂论列颇有见地。袁咏秋先生所撰两前言,阐释中华图书典藏文化的蕴涵,介绍纂述大略,寔为阅读指导。

作为责编,虽曾覃思于斯,却仅稍触皮毛,惟愿与读者开发中华典籍之文化蕴藏。

胡双宝 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通讯地址:北京海淀区。邮编 100871。

(来稿时间:1998-07-24。编发者:徐苇)